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上）	阎 淮
【难忘岁月】	“牛棚”内外忆老罗——怀念罗荣渠先生	郝 斌
【史海钩沉】	历史，岂能忘却？	山野村夫
【书刊介绍】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上）

• 阎 淮 •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一、二两节）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1966～1970年）

第一节 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我们干部子弟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当时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可能是群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数据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感谢邱、原二校友！

3—1、当了三天造反派

5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蒋的提法与毛主席同毛远新的谈话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杀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6月

1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蒋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2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5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冲出去？”我答：“我这个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如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下不如群众，贫农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3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4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和1957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人贴出《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真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字报，用“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向系领导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压制运动，赶快改弦易辙吧！”

6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齿，我忍无可忍，于是——

7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工程物理系二年级的四名干部子弟党团员，贴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内容是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卑鄙做法。“反党委”同学贴出大标语：“清华的聂元梓站出来了！”，广而告之。

8—9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被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3—2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6月10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11—13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当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革命的话，还管了点用。

14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我文革前较左、6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谁？我于是成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了。

15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6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17—18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不动。

19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21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此前，19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6月24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组掌权了，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整了人。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纠察队在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同班同学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

——我现在记不清“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开展了“反蒯运动”。王克斌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分子隔离

审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轻”也是整人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后来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错了人”，我认识到不是“整错了人”而是“整人就错”，我也犯了大错误！

7月6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巨大胜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3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转。

3—3 分别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7月25、26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我大吃一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地像见到毛主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噉地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者呼喊口号。顷刻之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有多讨厌。

7月27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示弱。继6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注意。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一楼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费解、更惊人之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向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

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长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的党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让我们“且听下文分解”吗？20天后的“八一八”，下文分解了——我在天安门上，看到刘少奇的再次尴尬。从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真是“那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给刘少奇的下马威！

第二节 红卫兵总部委员上了天安门

3—4 清华红卫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低年级的干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开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来清华作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我系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8月中旬，自动控制系的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组，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正式公开成立了。”

19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5页交待如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存众批语，某夜晚，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数据，偶然发现50年前的真迹史料，摘录于上，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六人联络组，实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五人。我说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五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人，组成“红卫兵全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高干子弟汪担任。我假谦虚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飫、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其他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和保守，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有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各系文革主任组成，他们都参加了清华红卫兵。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的乔冠

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临筹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我们红卫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8月4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周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5—6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7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从此他们自称为“八八派”，其重要成员（1967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八八派’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21页，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与前一天成立的“八八派”对着干。我们自称“八九派”，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10—15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叶林等三位组长，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于公，他们少数派是真正的“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人，直捣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子弟为主导的多数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3—5 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8月16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红卫兵”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两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工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里，自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五人，都来了；3：1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人民大会堂，在等待时也不罢休，直到21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周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乡！”当我说父

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韞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他在国家计委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能叫出他的姓名。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的用词）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应该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的出身问题。

“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晨4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3—6 “八一八”上天安门

8月17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革命大会”。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8月18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6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5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和物九的金东锡（第五人忘了），与清华“临筹”及红卫兵的骨干共50人，和各校的1500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我们在东面。

7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沸腾，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7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8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9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1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导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后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请她发表意见。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我的朋友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我们还宣布次日要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

3—7 结识陈元和宋克荒

8月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搞形式走过场，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带上大轿车准备带回清华。汽车刚开动，我们的大轿车就被一辆小轿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我顿时软了。

“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加上两个字，变成“斗蒋誓师大会”收场了事。

这两人便是宋克荒和陈元。当晚，他俩感谢我协助他们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保护蒋南翔的任务，我则回谢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力挽狂澜，免于我们违背总理意图犯个大错误。宋克荒说：“昨天我得知你们红卫兵今天要揪斗蒋南翔，立刻给王任重打电话。我认为蒋校长虽有错误，不反党。今天中午王任重找到我，说周总理指示蒋南翔不能揪斗，他派车给我，让我去保护蒋。我赶紧拉上陈元，去高教部，从你们手里抢回蒋南翔。”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动控制系一年级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文弱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陈元和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似乎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者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20年的生活轨迹。

3—8 清华“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8月22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雨不让我们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周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8月24日降临了！

晨5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91班孙某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袖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任重的秘书，征得王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要求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他们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北面的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时，12校红卫兵两千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近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18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我派头头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黑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3—9 我犯了严重错误

8月24日下午5点半，12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所长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小学的师生2万人，家属3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百余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帮助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的家，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我赞同所长意见。

据《清华文革亲历》48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罪证”“赃物”，“坏人”让居委会记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军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

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自己已经老年痴呆。日前听同班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当时我正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参加这个革命行动。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数千人，抄家近10万户，逐出京城12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不愿区分中学生或大学生。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众。革命

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参见前文《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节录）17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应该彻底否定老红卫兵了，不能以当时的“真诚”自我辩护。坐牢的“文革犯”谁不真诚呀，下至“五大学生领袖”，上至“黄吴李邱”。在中国的“水晶之月”，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月26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文中说：“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天下不乱，我们就是要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这被公认是中央对我们制造的“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有了中央党报连篇累牍地支持和鼓励，我更认为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30页。）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让我们清华红卫兵去城里制止中学生打人。如上所述，我对撕大字报、毁二校门和抄家扫四旧，非常支持并积极参与。但是对打人深恶痛绝，便自告奋勇带了十几辆大轿车的600人到打人最凶的崇文区。“红卫兵战士进城发传单，宣传十六条，受到群众欢迎。（《清华文革亲历》50页）实际效果却是车水杯薪。

8月底至9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流血牺牲之革命先烈的那些只流血没牺牲之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老红卫兵——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也就是保卫红色政权。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

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总部告假：“咱们红卫兵已掌控清华，我要到外地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非常支持。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2017年

~~~~~

## 【难忘岁月】

### “牛棚”内外忆老罗——怀念罗荣渠先生

· 郝 斌 ·

我和罗荣渠先生相识在“牛棚”，我称呼他老罗。

那个时候，不分长幼，没大没小，已经很有几年了，进了牛棚，达于极致。有监管学生在场的时候。不管是谁，彼此直呼其名。对系里的老先生：“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杨人梗！”学生这样喊，我们也这样喊。监管学生不在了，干活劳动，在一个屋里住，总有接触，这时候，对辈分高的，尽量避开称呼。用肢体示意，可以减少彼此的尴尬。年龄相差不大的。就称呼“老某”——既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痕迹、没有“四旧”，抓不着辫子；在我们之间，也算是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和尊重。这种称谓的个中滋味，时过境迁，局外人未必全能体会。

老罗，长我七岁，高我九级。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讲师了。路上遇到了，我向他鞠躬，他不理会的时候居多，间或点一下头。我想，他不认识我。我毕业以后，与他同系共事，直到文革发生，前后足有八年。中间的一九六零——一九六二年，大家肚子填不饱，活动少，不大见面，而在此前和此后，历史系处于动荡之中，教师们你出我进，身在田间的时间比学校要多。一个学年到头，难得一见。偶尔在文史楼前相见，他还是略点点头。我们好像没有交谈过一句。这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矜持，听世界史的老师说，他的英语、俄语都不错，人有点骄傲。

到牛棚里，就亲近多了。白天一起劳动，晚间一个大桌子上写罪行交代，夜晚睡在一个大屋子里，二十四小时全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就寝熄灯以后，监管的学生在门外上锁，我们多数人适应性很强，练出了一夜不尿的功夫。这样的时光度过大概一年多。这一年多，彼此间还是没有多余的交谈，跟以前差不多，但默默的有了观察。牛棚里观察人，说来比较容易。吃、穿、住、用，大家没有区别，每人罪行的轻重，略有差异，这也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每人头上都有压力，面对压力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被关的地方叫太平庄。在明十三陵的定陵北边，相距五、六公里。这里原是昌平县绿化大队的一个林场，砖房二、三十间，坡地八、九块，分布在几个山头上。一年以前——一九六五年，历史系搞半工半读试验，昌平县把这个林场连房带地，划给了北大。文革一开始，大家赶忙返回学校闹革命了，林场闲置下来，留下了一个炊事员和一个林场的果树技术员。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历史系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二十余人，正在校园里劳动，忽然来了系文革的通知：劳动暂停，两个小时以后，带上行李和毛选，原地集合，不得有误。集合以后，有人前后押着，领我们走出了东校门，来到京包铁路清华园站，上了北去的列车。此时人人忐忑不安，面面相觑。车到南口站，被勒令下车。各背自己的行李，押向东行，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从北大出发，一路行来，真是前途莫卜，幸亏我们中间有人到过太平庄，南口站下车往东一走，就有人悄悄说：是去太平庄！我们才算一块石头落地。去太平庄这个

主意不知是谁出的。历史系有个牛棚，北大民主楼西侧有个牛棚，历史系的在先，民主楼西侧的在后。是不是校文革从历史系受到启发，才修建全校的“大牛棚”，没见材料说明，不得而知。可北大的“牛棚”一建，足为各地的榜样。“牛棚”由此遍于国中，受冤受害者何止千万！始作俑者，如今清夜扪心，不知作如何想。近日见《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一年一月），聂元梓说，她负不了这个责任。

话说远了，还说太平庄。劳动有定量，每人每天挖一个树坑。生土刨出来，见晒见风，经过一冬，来春栽树回填。一个树坑的规格是深、长、宽各一米，也就是说一天要挖一个土方。可太平庄这个鬼地方，石头多土少，碰上大块石头，就白干了，换个夸张的话，可燕山的寒风真是刺得骨头缝生疼，一镐下去，只见一个白点儿，刨不动了。进度日减，骂声日高。春天到了，要在山坡地上翻地栽白薯，重活儿是挑水上山。几块山坡地少说也有几顷，我们老少近二十个人，不知道怎么能够完成。一天，忽然被喊下山来，要我们打开所有空置的房间，半工半读期间学生间的床都在，检查一遍，坏了的钉一钉。第二天，校内的“牛鬼蛇神”，大队人马被赶到这里。一个个灰头土脸，从肩上放下行李就如同得了大赦一般。一位胖胖的中年人放下行李，连自己也倒下去了，任凭监管学生喝斥，好一阵才算起来。有人告诉我，他是西语系的副教授，姓吴。来的这批人里，许多我认识，名教授不在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就凭这个队伍，办一所大学，可以计日程功，而且就学科齐全的程度和学术水平来说，现今的不少大学也难望其项背。

大队“牛鬼蛇神”到来之前，已经形成监管规矩。一日三餐，餐前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背诵“语录”，而后齐声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分别喊出自己的名字，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我的帽子只有顶：现行反革命分子，老罗被赶入“牛棚”之后，帽子比我多了一项：“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老保翻天急先锋”。（1）有的人帽子甚至多达五顶，丢了哪一项，都惹来一顿吆喝。这种规矩足使我们受辱和难堪不说，一个上午的活儿干下来，正等两个窝头到口，可还没有吃，先一通“请罪”，已经让人恶心快呕了，看着窝头也吃不下去。不过，时间一长，疲了，“请罪”如仪之后，窝头照吃。谁知大队“牛鬼蛇神”集中，境况大变，监管突然严起来，而且花样翻新，整人整出专业水平。

这时候，例行的列队集合一天之午饭前、下午开工前、收工、晚饭前“语录”，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里选出来的。读了这两段“语录”就能促使我们“认罪”，红卫兵们好像深信无疑。然后派活儿，宣布什么事儿，也可以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这是最让我们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是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人格，什么叫师道，那就全是马尾栓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群，有一阵，武斗用的长矛也出规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种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既可作为利器，也可作为钝器。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只见它在眼前晃动，但不见拿这种“家伙”的是谁。一位老先生，“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辨了两句，就被这“家伙”当头一下。我和老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相距七、八米远，“当”的一声，我能听出那是脑壳发出来的声音。每次听到集合哨响，要跑步列队，迟到的不能入列，那就是一顿老拳了。集合的操场在山坡中间，路面高低不平。我是腿脚利索的，跑到位置，迅速摘下眼镜，放在手里，听到一声“解散”才敢戴上——挨两个嘴巴，还受得了，眼镜如果打坏，行动由此迟钝，走路、干活儿处处有错，那就天天有打了。周一良先生的眼镜被打坏，幸亏他有一副备用的。高望之的眼镜被打坏，看着都让人担心，不知道碎碴儿会不会掉进眼里，可是不戴它又怎么办呢。我们戴眼镜的“牛鬼蛇神”个个知道眼镜对自己的意义，老罗也是。可他的近视度数太深，眼镜摘早了，脚下看不准，摘晚了，又来不及再摘。他应付这样一种环境，比我要困难得多。

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动前行。否则，监管者举起手里的长矛——“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这个规矩，给老先生们的压力极大：上了岁数，起夜多，眼神又不济，弄得晚饭以后就不敢喝水了。一位老先生起夜出门，战战兢兢，眼见二、三十米以外有人，连忙口喊：“报告——我是反动权威……”，谁知对方听见人声，也忙不迭地口喊“报告——我是……”报告过后，双方都不敢前行，等了又等，等了又等。读者朋友，现在离那个年月远了，您千万别把它完全当成一个笑话。我同朋友们说起这段情景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得弯下腰来，可有人发现我眼边挂了泪水，赶忙敛容道歉，改换话题。读者朋友试想，身处此境的人，有谁能不害怕那个“不吃素的家伙”，敢向前多走半步呢？！我衷心期盼有更多的青年朋友知道，四十年前，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在大学的校园里，这类让人挂着泪水讲的笑话，曾经很多很多。它应当构成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章节，引为耻辱，永远不被忽略和忘记。

监管者除去使用自己的眼睛，还在我们中间寻找“耳朵”。我们被鼓励相互揭发，即所谓“立功者受奖”。这招儿真是不同寻常，它弄得我们互存戒心，彼此提防。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神经紧绷，不能有半刻松弛。比如说，监管者从“毛选”中每天指定一个长段文章，要我们背诵，上午、下午劳动的两个间歇各有十五分钟，不能喘气，就赶紧拿出“毛选”，紧记硬背。就寝之前，两个人一组，相互检查。对方背不下来的，检查者要报告。我和老罗每天都可以背诵无误。受我检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老先生，他背得常常有误。我如据实报告，他免不了受苦；我不报告，又怕他去自首。万般无奈，每当监管学生进来，我就要全神贯注，只要老先生稍有嗫嚅欲言之状，我就起立，先喊报告，免得他以自首来揭发我。这不是多虑，实在不可不加防范，那时候的人心就是如此。“牛棚”之中，以打“小报告”换取稍好处境的人，颇有几位。“监管”的花样越多，压力越大，“小报告”越多。有一次晚点名，五、六个手持长矛的学生站在队列之前，气氛异于往常。一个学生劈头一声震吼：“昨天夜里谁说梦话了？站出来！”这一声喝问，问得我们人人心颤，谁能保证说梦话的不是自己？硬按到你的头上，你又如何辩白得清楚？“小报告”打到这个水平，固然可恶；相信这样的“小报告”也未免可悲，可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让人心、道德和智力沦丧到这个地步，非但不予以收拾，只是一味放任而从中巧为运用者，又曷能辞其咎欤？这个时候的老罗，在我眼里，“矜持”全都没有了，倒觉得他太认真，过分地认真。白天干活儿，没有学生在场，水不少担，土不少装。晚间写交代，小字儿写的密密麻麻。他对自己近乎苛刻，可对同“牛棚”的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日子一长，谁打“小报告”彼此都有了数。老罗不是这样的人。“小报告”他不会，甚至连起码的随机应变之术，他也不会。监管学生一时兴起，拿我们开涮，让我们也开个“大批判会”，批判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这样的会一开，那就热闹了。调门之高，嗓门之大，另成一番景象。有人要趁此有所表现，希图改变他可怜的处境。我敢断定，要是允许动手，准会有人出手。但多数人难于一下转换身分，只能作蹩脚的演出——可演出也得演一下呀！老罗偏偏不会。差不多别人都说完了，再拖就等点名了，他才嗫嚅着，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已经不是他的声音。我跟他相处已有一阵子，他的声音与容貌该当如何，我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他作自我批判，给自己上纲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不自然。

一九六九年秋，北大两千教工被指派到鲤鱼洲，老罗和我都在其中，我们编在一个排里，接触自由多了，也能放开说话了。鲤鱼洲，在江西省南昌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很有几分浪漫，然而置身其中，却全然两样。这是一片未经垦殖的红壤生荒，地势又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涨水时节，水面会高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拦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离堤坝二、三米，清风一阵，浪花会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来劳动的人头和草棚，尽在十几米的脚下。真是有堤分水旱，堤决共鱼鳖。挑土加堤

的江西老表说，这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你们来干什么？整个农场一眼望出去，没有几棵树。当阴云密布、雷电轰鸣之际，谁站在地里，谁都会感到雷电就在头顶，不能不联想起“尖端放电”。一位先我们而去的清华教师“斗私批修”讲用，讲出了这种感觉，被当成不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听了当时也一笑，后来身临其境，一点都笑不起来了，雷电一来忙不迭的赶紧蹲下。

种了一年水稻，忽然有决定，说鲤鱼洲这块宝地，既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基地，也要办成大学——要招收学生了。现在回头看，那是个笑话。两千教工在这里，有几本书呀，人手一部，都是毛泽东选集！除此之外就是信封、信纸。难怪工农兵学员扛着行李走入草棚，喝了绿豆汤，受到教职工的热情接待之后，还以为这是他入学途中的一站，“北大分校还在前面！”

进校的学生第一门共同课是中共党史，没有教材，要现编一本。编写的方针是“就地取材”，编出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特色；办法是编写者先到安源煤矿、井冈山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革命圣地延安接受教育，同时收集资料，以此为纲，编成教材。有五、六个人接受这个任务，也有老罗和我。出去参观学习了两周，捧回一迭展览馆的说明，以此作为依据，就在南昌动起笔来。幸亏才编到一半，北京先编好了，印出来，送到鲤鱼洲了。我们奉命停笔，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教育革命”任务，前后合算起来，最为愉快：既能堂而皇之走出去转了一大圈，又没有编写什么糊弄人的东西，心里高兴，只不过我们都矜持不露罢了。比较起来，老罗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当初我们几个人出行，起个大早，离开草棚走向码头。那时朝曦初起，晨风煦煦，每个人心里的那份高兴就没法说了。但以当时所在的环境、气氛来说，总要有几分克制才好。草棚尚在身后，人影渐稀，走着走着，老罗的鼻子里竟哼出了歌曲，调子好像也不是当时该唱的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我眼前还时时浮现这个情景。

从鲤鱼洲回到北京，我和老罗有了个人之间的来往。那时候，未名湖的鱼不少，打捞上来，全校教职工分享。有一次，分了足有十斤以上。我带着上小学的女儿住在集体宿舍，想打牙祭，既没有炉灶，也没有那么多的油，只能望鱼兴叹。老罗约我到他家煮鱼汤，连汤带鱼，味道都极好。那时候，他的夫人周颖如在干校劳动，大女儿罗曙插队，小女儿罗晓好像偶尔回家。此后，我常到他家。他是四川人，烧得一手好川菜，为照顾我口味，还少放辣椒；饭后聊个天南地北，这是我们的精神得以舒展的一刻。有一次他翻箱倒柜，拿出来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的扇面、花鸟。另有几幅，老罗说是他父亲的手笔。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罗文谟，上海艺专出身，书画虽属余兴，却有很高的造诣。他保存下来这批字画，冒了不小风险。就是拿给我看的时候，虽不像文革初起时必烧之而后快，但仍属犯忌之物。他肯于以此示我，我感受到一份无言的真诚和信任。

老罗的笔头是大家公认的，他也总想以此得有机会写文章出力，但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实在有限。那个时候，三、四个人，写了文章，或贴在墙上，或抄成黑板报，一个任务：“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老罗不是历史系大批判组的成员，但常被拉去写文章。一九七三年，政治风云诡谲莫测，京中时有传言。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编辑部出了一个题目，约历史系大批判组写稿。老罗参与讨论，独持一见，而且坚持不让。他当时跟我说过此事。平心而论，他表现出来的，是专业的水平和学术的风范，但有一点：太不合时宜，也不是地方。大批判组写了一稿，他一个人另写一稿，两稿同时送到《红旗》，结果老罗的落选。老罗非但没有因此换得什么觉悟，甚至喃喃不平有好一阵。在繁纷变幻的政治面前，老罗实在显得太稚嫩，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如果不戴有色眼镜的话，你也许能够看出他时时要掏出来的，是一颗晶莹的心，掏得那么真诚，那么执拗。话说回来，凭着这份真诚的执拗，让他同一个机缘擦肩而过，免除了后来的许多麻烦。一九七三年末，“两校”大批判组

成立，以老罗的笔力而论，他未必不是上乘人选，但“两校”根本没让他沾边儿，这就绝非偶然了。

可是另有厄运等待着老罗。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间，林彪摔死之后，轻轻吹来一阵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应该批判。这阵风吹动了不少人的心——从文革开始，天天反右，越反越“左”，一连六、七年，“左”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现在，这个信息虽是从报纸的字缝里透出来的，也足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免不了要抒发胸中的积郁，说几句“早该如此”的话。谁知风云突变。各大报刊的社论用一个声音告诉大家：林彪这个家伙的实质是极右——批判林彪，不是批“左”，而是批右——我们怎么硬是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呢？按照以往学得的有关路线斗争的因应之道，赶紧检讨自己才是：觉悟太低，擦亮眼睛，提高路线觉悟等等。可这回老经验没用上。这回，一上来先批反“左”那股风，那股风叫作“右倾回潮”。保卫文革成果，必须先反击“右倾回潮”。乖乖！这阵风一来，足有七、八级。北大、清华身居“六厂二校”的荣誉行列，属毛主席亲自抓的点，自然就是风暴的中心。历史系，尤其是老罗所在的世界史专业，“反回潮”格外起劲儿。一来二去，从“反回潮”开始，战果扩大，挖出一个“小集团”，老罗是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罗荣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在教室里回荡。文革初起，喊的是“打倒×××！”不失简洁和干脆，具有口号的特质。现在喊的，有点文诌诌，好像柔软了好多。其实不然。文革初起，“牛鬼蛇神”一大片，而且越揪越多，“底面积越大，压强越小”这个力学原理，放在社会学中，也蛮适用。历史系的“牛鬼蛇神”站在台上，一字儿排开，二十几个。我们固然要向革命群众喊起“打倒×××”的口号，也要二十多次，其中只有一次喊给自己，剩下的都是作陪。现在，历史系的重点批判对象，一个喝了敌敌畏，在医院里抢救，批判老罗的大会，却从历史系移到第二体育馆——地点的转移标志着批判的升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连喊了几天，我见老罗的脸色有变，那可是“牛棚”里没见到过的脸色。

读者朋友，大家关注的是初起之时那场狂风暴雨，造成多少冤屈；而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在北大，也是一场几乎等同一九六六年的政治风暴，对此知之者不多。身处其中的我们，一时间又回到了“道路以目”的年代。我同老罗在历史系见了面，彼此把头一低，擦肩而过，谁和谁都不招呼，何况说话？这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投到校外的邮筒，寄送他家。写的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很费了斟酌。只有几行，让一个正在挨批的人看了，会有一点慰藉；让别人抓住，上纲上线也不好说它是“黑信”。我在“牛棚”有一封信被打成“黑信”惹来一场专题批斗。这个经验对我起草给老罗的信稿，很有警示的帮助。大概个把月之后，在动物园车站，我和老罗相遇。他告诉我，信看到了，也毁掉了。除此之外，就这件事，我们谁都没再多说什么。

几年之后我知道，那个时候老罗被逼几乎走上不归路。文革初期他挺过一关，已属不易，元气还没有恢复，又是一拳重击，再挺过来，那就不是常人的一般毅力所能承受得了的。第一次，那是乱哄哄的“群众专政”，这一次可是有领导（中央派来的军工宣队）、有组织（事先安排好的批判发言）、定了性就算数的政治批判！外貌白晰纤弱的老罗，内心真是坚强，他不仅又一次挺过来，到一九七五年，精神完全恢复，甚至以回首往事的笔调，把这番磨难写入诗文，生死关头的一场徘徊，算是置诸脑后了。九零年代的某一天，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要到我家。他带来一幅他的行书，装裱得很精致。他在墙上指个位置，要我打个钉子，当场挂起来。那是《答友人书·七律·旧作》。前四句，写了我们在鲤鱼洲那种环境下难得的一点快乐，接下来“冬夜冰雪惊凉梦”，则道出他二次落难时的感觉和心境，“春宵寒雨暖华章”，算是对我十几年前那封信的正面答复。让人感动的是最后两句，他又成了一个心情愉悦、向往未来的人。



一九七八年，全国的形势才见根本扭转。这时候，历史系准备招生，文革后的教学该怎么搞，新任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以极大热情在筹划；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量极大，副书记郑必俊、张万仓全力担当起来，而且做的干净利落；学生工作，由副书记王春梅一手完成，不劳别人操心。我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没分工管什么，每天也忙忙乱乱，不知干了什么。原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历史学界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文革初起被拿来祭旗，批斗了一个够，后来生给逼死了。现在给翦老平反和昭雪，是一件大事。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面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

进入八零年代，老罗的日子有如拨云见日，政治上的压力一件一件消失，最后消除净尽。他本人的“历史反革命”冤案，得到昭雪；他的一个弟弟蒙冤多年，也平了反。最后，他的父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仅不实，原来还是位秘密协助解放军进入成都的有功之士。父亲的冤屈，一直罩在老罗头上，这片阴影，三十年挥之不去。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提到出身和家庭这个话题，老罗只能埋首无语。这在老罗心头简直铸成了一道槛儿——他不管如何用力，都迈不过去的一道槛儿。如今这槛儿不存在了，不再为它费神费力了；作为一介书生，这时的他，还有什么希冀和追求呢？我们看到，他的专著一本一本出版，论文一篇一篇刊登。有一阵，老罗一个月完成一篇三万言的论文。一连三个月写出三篇。老罗的才学，在历史系，有过人之处，我们是知道的。只因有恨事，常抱未舒心，现在，他的心情好了，用不着再压抑自己，才显现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纵横！文章写得快，他的书法继承了家学，居然三、五年功夫，也自成为一格。

综观老罗的一生，穷达俯仰，都同文章紧密相联。文章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眼里难道就没有比文章更重要的东西了吗？他另有一幅集句，写成立轴送我，写的是：“岂有文章惊海内，但留清白在人间。”

三十年来，我对他的称呼——“老罗”——一直没有改变。最初，那是一种特殊环境里的变通，后来，是朋友间的无拘无束，最后称他“老罗”，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知。

注释：

1，一九六七年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先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等场合，严正指责中央文革小组乱党、乱军。随后，毛泽东批评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们检讨。这场政府和军中元老合力反基击“文革”的正当行为因之受挫，并被称为“二月逆流”和“老保翻天”。当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聂元梓任主任），趁此大局变化，如法炮制，将反对聂元梓“造反”的师生多人，打为“老保翻天”。罗荣渠曾有笔锋犀利的大字报揭露聂元梓，因此被打成“老保翻天急先锋”，赶入“牛棚”。

□ 来源：《爱思想》网

~~~~~

【史海钩沉】

历史，岂能忘却？

——记谭厚兰的滔天罪行之一“曲阜讨孔”

• 山野村夫 •

一、文革首长面授机宜 纪念碑前讨孔誓言

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谭厚兰只身来到红旗杂志会客厅，不一会儿客厅的里门打开了，关锋、戚本禹、林杰等陆续走进来，谭急忙走上前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首长。“坐下，坐下”关锋摆着手让谭厚兰坐在自己的旁边：“最近师大运动的形势如何呀？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形势大好，就是外地的红卫兵来京取经，接待的人手不够有些忙不过来。”

“这没问题，发动全校师生搞接待嘛。好了，下面还有个重要会议，我就长话短说了：北师大是教育界的领头羊，给你们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到山东曲阜破四旧砸烂孔家店。”戚本禹接着说：“讨孔任务是无上光荣的，尤其师大讨孔更有时代意义，这是要功彪史册的；曲阜讨孔大长工农兵的志气，大灭封资修的威风。你看康老（注：康生的代称）还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一张图，是他想了三天三夜，画出的孔府孔庙孔林的印象图。他明确交代，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关锋又说：“到了曲阜，不要孤军作战，要注意发动和联合当地的红卫兵造反派，谁敢阻挡讨孔就造他的反。”讨孔的任务交给北师大，让谭厚兰受宠若惊，她激动地说：“谢谢首长的器重，保证完成任务。但我有个要求，为了更好的鼓舞士气，请林杰同志给我们做一次战前动员。”“这没问题，时间由你和林杰确定。”关锋点着头，说完起身走出会客厅。

11月2日，红旗杂志的笔杆子林杰来到北师大的新二教室，面对近二百名的“井冈山红卫兵”骨干做了“曲阜讨孔”的动员报告，大意有如下几点：

1）“五四”运动第一次喊出“砸烂孔家店”，但不彻底。今天我们要亲临战场、彻底砸烂孔家店。

2）儒家的要害是“中庸”，就是调和就是投降，孔孟之道是束缚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让我们革命小将将“孔孟之道”砸它个稀巴烂。

3）你们去山东讨孔，可能会遇到阻力，你们要坚信：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中央文革支持你们，毛主席支持你们。

4）国务院是最大的保皇派，什么“重点文物保护”的石碑都可砸掉，等等。

“战前动员”之后，谭厚兰们制订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等文稿，同时派出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准备，11月7日在戚本禹、林杰的直接支持下，谭厚兰（总指挥）、董连猛（副总指挥）、王瑞龙（作战部副部长）等人率领着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230余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合、亮相并宣誓：

万恶的孔家店，统治和奴役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它吸尽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鲜血，吞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血债累累，罪恶滔天！孔家店是一座吃人的“阎王殿”！

孔老二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制造一套反动的“礼教”理论，要人们服服帖帖，甘受奴役。

孔老二大讲“中庸之道”，企图掩人耳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他是折中主义的头号鼻祖，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大辩护士！

孔老二似乎以教育为“专长”，但他主张“学而优则仕”“焉用稼”，使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剥削阶级培养忠实奴才和走狗。其实孔老二自己正是一切剥削阶级丧家的乏走狗！

.....

孔老二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学说是反动的学说，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孔家店就是反动势力的老巢！

.....

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广场中央，即将走向征途的战士聚集在这里向党中央宣誓、向毛主席宣誓：我们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高举革命的大旗、造反的大旗，向反动势力的老巢孔家店进军，彻底造孔家店的反；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它个稀巴烂，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二、扎根串连建立联络站 大造舆论炮对孔家店

11月9日，谭厚兰、董连猛、王瑞龙等率领着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230余名乘火车到达曲阜。因事先电话联系，车站上早有曲阜师范学院、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们，列队站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在曲阜师范学院，谭厚兰马上召开各校红卫兵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密谋和策划讨孔行动日程。

12日下午宣告成立“全国红卫兵彻底捣毁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讨孔联络站”），谭成为联络站的当然第一领导人，并且为造舆论还创办出版了《讨孔战报》。（注：从1966年11月10日创刊，到后来有曲阜师院师生参加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直到67年8月停刊，共出版了23期，《讨孔战报》为疯狂讨孔、大肆毁坏文物、炮轰国务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宣传和争取群众，连续几天，谭厚兰指派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在城区、在农村的街头，到处演唱“讨孔”战歌：

孔家店阎王殿，
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文化革命战鼓响，
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
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

孔老二大坏蛋，
反动透顶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红旗飘，
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
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
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

在闹市区上演丑化孔子的活报剧、散发五颜六色的印有讨孔檄文的传单和漫画，墙上到处涂着“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砸烂孔家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标语，揭发孔家店的罪行，举办孔氏罪恶展。谭厚兰们不失时机地到处制造“讨孔”舆论，为下一步捣毁孔府孔庙孔林不遗余力地做着精神与物质上的准备。

三、砸碑掘坟伤天害理 捣毁文物罪恶滔天

11月15日上午，在孔府门前聚集着北师大和曲阜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以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还有当地的一些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两千多人。在这里，“讨孔联络站”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谭厚兰和其他红卫兵头头分别宣

读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告全国革命人民书》等文告，公然污蔑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在曲阜“三孔”等处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是保护孔府、保护孔庙、保护“孔家店”、保护“四旧”，一句话就是“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他们郑重宣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会后，董连猛、王瑞龙等头头们带着红卫兵造反派挥动大铁锤，将国务院立在孔府大门西侧的石碑砸毁。砸碑，对谭厚兰们来说，意味着搬掉“讨孔”的绊脚石。随后，他们一鼓作气又将国务院立在孔庙、孔林和鲁国故城等处的标有“文物保护”的石碑也统统砸毁，并且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等处拉下匾额、捣毁塑像。

11月20日，谭厚兰们又发表了洋洋三千字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中等学校、文教宣传机关、红卫兵战士、工农兵同志、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切革命同志们的《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

- 1，孔家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基础；
- 2，孔孟之道是中国人民的大敌；
- 3，彻底打倒‘孔家店’，打破四旧，大立四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 4，痛打落水狗；
- 5，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
- 6，打一场人民战争；
- 7，深入工农兵，进行革命大串联；
- 8，举行彻底打倒‘孔家店’，打破四旧的游行示威大会；
- 9，为新生事物鸣锣开道；
- 10，建立全国讨孔联络委员会。

11月28、29日，在曲阜师院的操场上，“讨孔联络站”继续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曲阜师院及其附中、山东水利学校、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之外，还有曲阜各县各人民公社调集来的大批农民和从工厂抽调的工人共约10万人。

首先谭厚兰讲话，诬蔑儒家思想反动，“孔家店”罪不容赦，谴责曲阜县委和山东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尊孔复古，保护“孔家店”，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应该公开检讨，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接着讨孔指挥部副总指挥董连猛再次宣读《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十点建议》，然后董连猛宣布：把牛鬼蛇神押上卡车，游行开始！等候在操场大门的红卫兵早就把孔庙大成殿的孔子塑像头放到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正前面，高大的头像上带着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头号大坏蛋孔老二”，“孔老二”三个字还被红颜色重重地打了个大叉子。当年，孔子出行周游列国时，坐的是牛拉的车。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步入冥界2445年之后，其泥巴塑像竟能乘着国产的大汽车，四处去风光。而且，这次陪着他的头像游街串巷的，也不再是颜回、子贡、子路等众弟子，而是20世纪研究其思想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余修（山东省副省长）、周予同（复旦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高赞非（曲阜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等。他们都是1962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出席者。现在，他们被红卫兵揪来，脖子上挂着姓名上画有红“×”的大牌子，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同车陪着孔子像游街示众。

汽车驶出曲阜师院南大门，折而向东，在曲阜城内的古老街道上缓缓行进，开道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不断反复播放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用喷气式状押着“牛鬼蛇神”的车上，红卫兵用手提式喇叭一一介绍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地主的孝子贤孙”的姓名、身份与反动言行；车后还有大批的红卫兵列队随进，他们挥动着红宝书，也是不断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孔老二、油炸孔老二”，“彻底砸烂孔家店”之类的口号。街道两旁，站立着许多怀有不同心态的观看者，多是当地百姓。

游行完毕，向孔林进军，汽车开到孔林墙外的西南角，在小桥下面的小河沟里已经燃起熊熊大火，正焚烧着从孔庙、孔府等处拉来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斯义在兹”、“生民未有”等各种历代的巨型木制匾额，同时烧掉的还有从孔府搜出来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典书籍如装帧考究古香古色的明版《礼记》、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保存千百年的文物。大火熊熊，红卫兵高呼着口号，游行卡车上的孔子头像也被掀到火海里一起焚烧。此时，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着红卫兵造反派破四旧的“壮举”。

其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早在11月1号就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谭厚兰们是很有“底气”的。现在时机成熟了，他们一鼓作气、立即组织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向孔林的孔坟进军，扒坟掘墓戮尸扬灰，干着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坏事。墓前的那通高大的墓碑涂满了口号，红卫兵用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高音喇叭响了：“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只见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为了更快掘开墓穴，造反派还动用了雷管与炸药。

他们挖了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近两代孔祥珂、孔令贻的坟墓。因年代久远，孔子祖孙三代的墓冢，虽下挖深深的坑穴，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倒是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槨中，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元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孔祥珂、孔令贻是孔子的第75、76代嫡孙，也是在孔林掩埋的最后两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几个红卫兵从墓穴里扒出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还保存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像撒了气的皮球瘪下去，在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师大的红卫兵们往树上系了绳子，将尸体一个个吊起来，然后对孔祥珂、孔令贻等进行曝尸批判。挖出的几具尸体挂在树上被裸露着曝晒了五六天，每天围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因光着身子太不雅观，后来被人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烧掉埋了。

孔令贻的儿子第77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年88岁。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共和其他党派一再邀请来曲阜都遭到拒绝。他那冷却了的心并没被“捂热”，寒透心的孔德成至死也未踏回故土，甚至连在北京任“终身制全国政协委员”的姐姐孔德懋也不愿意相见。

四、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恶有恶报遗臭万年

谭厚兰们的“讨孔”丑剧终于落下帷幕，孔府孔庙孔林却一片狼藉；谭厚兰们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是巨大而难以弥补的。

1966年11月9日—12月7日，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大造“孔家店”的反，29天中，他们毁坏文物6618件，烧毁古书古籍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甚至绝版书籍1700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1000余座，捣毁孔府孔庙孔坟。据后来的曲阜市统计：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被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砸毁近千块。实际上，扒坟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亚圣孟子的母亲仉氏与孟氏族人墓地）、梁公林（孔子父亲叔梁纥与孔母颜征在的墓地）、少昊陵（黄帝之子、三皇五帝之一少昊的墓地）、东西颜林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曲阜城东的东颜林墓区是孔子弟子复圣颜回及其家族的一处大型墓葬区，林中有柏、楷等古树1770余株，碑刻300余通，文革期间，平坟毁林使整个墓区荡然无存。

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掘墓辱尸运动在全国发酵，刮起一场史无前例丧心病狂的“掘坟风暴”，历代忠良、名臣、学者、文人、义士如霍去病、诸葛亮、王羲之、魏征、包拯、岳飞、海瑞、于成龙、于谦、张居正、蒲松龄、史可法、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汝昌、康有为、秋瑾、武训、黎元洪、章太炎、赵登禹、等等、等等，他们的坟墓无一幸免，均被挖掘荡平。

1980年5月，曾任山东副省长的李予昂去曲阜，见到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景象，愤慨万分遂吟诗一首，并刻在残碑上：

万恶“四人帮”，十年逞逆狂。
少昊像颇碎，鲁故城拆光。
三孔大破毁，周庙受灾殃。
贼罪臭万年，历史诛巨奸。
首凶陈伯达，作伥谭厚兰。
留此残碑在，铁证代代传。

1978年李先念副主席视察曲阜时说：“对破坏文物的首要分子要严惩”，“谭厚兰破坏‘三孔’文物该杀。”

1968年10月，谭厚兰作为北师大政教系66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地处怀来沙城）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勒令回到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里，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待，证实文革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1981年谭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82年9月谭厚兰病逝于老家湘潭，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恶有恶报，谭厚兰们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 1.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讨孔战报》第一、二、三期。
- 2.张顺清：《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
- 3.《记忆》第154期，安希孟：《董连猛其人其事其诗》。

~~~~~

## 【书刊介绍】

###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

30年后的斯诺再次踏上中国国土时，他却目睹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北京观看了革命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后，斯诺明确表示了对毛本人被“无限颂扬”的不满：“现在，街上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每一间会议室里都摆放着他的半身雕像，他的著作和照片随处可见，而其他人的照片则不见踪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时四个小时表演中，毛是唯一的英雄。在演出的高潮时，我看到一幅根据我1936年拍摄的照片复制的画像，被放大到大约三十英尺高。”——丹尼尔·里斯《崇拜毛》〈导论〉

#### 《崇拜毛》

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著

秦禾声、高康、杨雯琦译，唐少杰校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最新出版

尽管很多著作都谈论过毛泽东在权力如日中天时党内外对他的崇拜，却还没有一本专著系统地探讨这种“崇拜毛”的现象及其本质。本书即是该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收集了大量机密档案文献、大小物证、政治传单等，在扎实史实基础之上，指出对毛的崇拜不同于以往的皇帝崇拜，而是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并层层分析了其背后逻辑和理性操作。研究集中于探讨对毛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不仅引人入胜地重现了狂热荒诞的历史现场和细节，更敏锐地发掘出在疯狂异化的表象背后，这种崇拜所具有的工具性、现代性与政治性。

本书为理解文革乃至中国的未来，提供了独到且富有洞见的角度，因为书中所讨论的崇拜现象及逻辑，在今日中国仍然没有走远。

作者介绍：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德国弗莱堡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系教授。

#### ◇ 学界推荐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教授）

这本关于毛泽东崇拜的研究著作，深刻犀利地分析了当代中国领袖崇拜的政治和概念起源。除官方媒体数据和中央指令之外，作者还使用了地方档案以及从旧货市场收集到的原始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将地方政府还原为更具体的基层干部、解放军军官、互相竞争的中共领导人等，他们在制造毛崇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中红宝书的出版，让亿万中国人得以直接学习毛语录，破除了由党垄断的解释权，并造成了持续的后果。本书对毛泽东崇拜的言辞与仪式的研究极具价值、引人入胜，并且告诉我们，对中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学教授）

里斯的大作基于难得的史料，为我们阐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的盛衰，其中大量档案材料是从未引用过的。对“崇拜毛”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里斯作了精辟的分析，并

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见解。至于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还是一个可称之为周而复始的形态，谅读者们自有评说。

唐少杰（清华大学教授）

本书是全世界第一部探讨崇拜毛泽东的问题和现象的专著。书中较细致地追述了这种崇拜的由来和演变，并深入概括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现和泛滥，十分具体地展现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在语言、媒介、仪式和用品等等层面上的诸多特点，进而颇为有力地从事当代世界中许多领袖崇拜文化的视角分析和把握了这种崇拜的影响、意义和取向。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功力和学理水平。

◇ 中文版序（节选）

几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书的英文手稿时，在大多数观察者眼中，对这位中国共产党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对毛的崇拜仅仅被视为一段越发遥远与离奇的过去，它的特征是对那位“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非理性爆发的仪式崇拜和明显不可理喻的言辞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怀旧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越发严重的政治环境下仍然继续依恋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少数毛主义顽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经丧失其全部的现实相关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最初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还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现象，分析这种领袖崇拜的具体形式和其出现的特定历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与当代的联系和在当代的传播；另一方面，我对这种崇拜背后的结构和功能十分感兴趣，这种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动员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运动的后期却被用作实现无条件服从的工具。对毛泽东的崇拜常常被简单地视为基于“天命”的合法性主张，或者其他神权概念中皇帝崇拜的传统的、精英主义的结果，或者按照文革后的说法将其视为封建“遗毒”。但通过将此种崇拜作为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基于媒体宣传、党内支持网络以及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进行分析，我对崇拜毛的阐释与以上这些说法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崇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一种沉闷枯燥的正统，通过展现人格化的符号来支持党的领袖以集中大众情感与忠诚；二是同时呈现出的破坏性潜质，即通过“卡里斯马式的动员”将领袖的媒体形象作为动摇党正常统治根基的资源，而这一点与关于共产党专政的性质与稳定性的讨论越发相关。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